

国企需挑起改革“大梁”

《北京青年报》，2016年8月9日

文/陈莉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未来中国经济将呈现“L型”走势。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告诉笔者，“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进的情况下，在重点产业领域实现突破，虽然不能完全改变经济增长走势，但可以做到让“L型”下滑走势更缓慢一些。改革没有坦途，但前途是光明的。因为我们等不起，也拖不起，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各项重点改革任务都必须在2020年之前基本完成。”

作为中央决策的“智囊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提交了不少对中央重大决策产生影响的研究报告，如：设立亚投行等。最值得一提是，2015年6月16日，徐洪才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首席经济学家面谈，达成中国投资EBRD、开展战略合作的共识，仅在两天之后，徐洪才的报告就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批示。2015年底，欧盟方面同意中国投资入股EBRD，现在亚投行已经与EBRD开展了联合融资等合作。

Q：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7%，持平于前值，为2009年以来最低。大家都担忧民间投资增速继续下滑，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您认为如何恢复民间投资信心？

A：从实际数据来看，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符合预期。对内，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可持续，两个翻番的战略

目标可以实现，对外也贡献了正能量。但是，困难依旧存在，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方针。

如何恢复民间投资信心？首先，要认识到政府的作用。在微观领域，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宏观领域，要立足保障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来强化政府的引导作用，更好地组织和管理经济发展。也就是要增强责任感、主动作为。要保障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给民间投资以信心，同时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不可替代作用。例如：提供引导资金和有实际回报的投资项目，加快落实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要公平对待所有企业，创造一个一视同仁的市场竞争环境。当前，经济生活中依旧存在“所有制歧视”现象，例如：国有银行偏好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人为造成企业融资成本的不公。

“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内容。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人总是希望“你去产能，我搭便车”，做到真正公平是关键。去产能不能简单理解为：关掉民营企业，保全国有企业。应坚决处置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同时，也需要通过积极扩大内需，主动消耗掉一些过剩产能，比如：提高我国建筑物的钢材使用标准，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等。

Q：“精准扶贫”已成中国扶贫脱贫工作最重要关键词，您如何看待我国精准扶贫工作？

A：精准扶贫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精髓和亮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重要保障。中央提出，未来五年要通过五种渠道针对 7000 万人口实现精准扶贫，“通过扶持

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其中，产业扶贫大概占 2000 万，还有一些搬迁安置等方式扶贫占 2000 万，剩下的 3000 万怎么解决是问题所在，对这部分人的扶贫，政府必须“兜底”。

我国扶贫工作已由过去“灌水式”、“输血式”的传统扶贫模式转变为精准脱贫、杜绝返贫；精准扶贫是实现扶贫、脱贫，全面小康的“最后一公里”，要彻底解决好这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对有些贫困户还必须注重政府“兜底”，对有的贫困户，只有实行政府“兜底”，切实做到“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否则，老弱病残始终是老大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帮助每一个贫困人口摸索出适合的致富路径。

随着扶贫工作进入冲刺期，要针对不同对象分类施策，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职业技能培训、整村推进、易地搬迁、保障兜底等举措是扶贫开发工作的“主轴”。相信这些举措的实施，将会形成巨大的规模效应，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Q：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国企改革，而国企改革中的核心又是什么？

A：国企改革是改革的核心。新常态下，国企需挑起创新驱动的“大梁”。国企要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统筹协调国企混改和国有资本重新布局的关系，要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公司治理，建立中长期激励机制，调动企业家创新积极性，并将部分国有股划拨到社保基金等。

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关键是从哪里使劲？重点突破应是国有企业的创新，要加大国有企业的创新力度。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国有企业拥有大量的创新资源，包括高端人才、雄厚资本和良好的研究设施，但缺乏激励创新的机制，限制了企业创新潜力发挥。因此，鼓励国有企业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创新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国有企业也要建立包容创新失败的机制，从而真正激发企业的创新热情。

改革的关键是要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建立现代国家治理机制。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的转换，以往一些行之有效的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现在可能不太管用了，这就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Q：近年来，中国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如何跟上互联网金融改革大潮？您如何看待我国金融创新的未来方向？

A：中国未来金融创新有两个方向，或者说有两个着力点（突破口）：一是互联网金融，二是资产证券化。近年来，很多互联网金融公司把资产证券化和自身业务有机结合，可能会如虎添翼。

目前发展比较成熟、运行较为稳健的业务，则是互联网支付平台：阿里的支付宝、腾讯的微信支付、京东的白条，以及各种电子银行支付。相比之下 P2P、众筹等互联网金融业务则未成气候。

我认为，传统的 P2P 信贷业务难以持续，因为它难成规模，在网上实现贷款方和资金使用方的正好匹配，实现资金规模、期限结构、

投资回报正好吻合，这是一个偶然事件。现在监管层从风险管控着手，对 P2P 提出很多要求，不能搞资金池、违规担保，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P2P 业务发展。同样，众筹也是一个小众市场，且众筹内部治理机制饱受争议，谁牵头、谁跟投，运营机制透明度等都存在一些问题。

未来互联网金融要在坚守底线、加强监管的前提下，鼓励创新，创业激情需要保护，不能把孩子跟脏水一并抛掉，也不能因为害怕风险而一味地抑制创新，因为不创新才是最大的风险。但是，也要加强对创新业务的理解，不能无知者无畏，最终酿成大错。未来互联网公司要向金融靠拢，金融公司也要向互联网靠拢，要解决中间融合的问题。

传统金融在风险把控上有一整套成熟的做法和经验，这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互联网金融颠覆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银行仍是我金融行业的主体，同时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服务于企业的多层次融资需要，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无论如何，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基本内涵是不会改变的。例如：提供资金支持，担当资金中介，提供中介服务，促进资金跨时间、跨空间进行有效配置，即促进资金在不同空间里的自由流动、期限结构转换，都是金融的基本内涵。不能因噎废食，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刚刚起步，未来发展空间很大。此外，互联网跟云计算、大数据相结合，信用体系建设要配套，这些都是发展趋势。

Q：下半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基调和货币政策取向将如何变化？

A: 稳中求进的基调不会变，财政政策要在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作用，货币政策要体现更大的灵活性、针对性和前瞻性。

政府可以适当扩大支出，在一些民生领域、公益事业领域发挥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资，鼓励创新创业活动，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其次，要减税减负，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是本届政府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减税，2016年减税金额将超过5000亿元。全面推进营改增改革有利于拉动经济，特别是在当前许多行业、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的情况下，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让企业轻装上阵，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

至于货币政策，应该大道至简。最近两个月，广义货币M2增速都只有11.8%，稍微低了一点。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M2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都要保持在13%左右。我们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同时增加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做好预调和微调。

总之，改革无坦途，这句话反映了改革之艰难。但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各项重要改革要在2020年之前基本完成，也就是说，改革是有时间表的，各级政府和党员干部都必须增强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